

外国音乐理论与技术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E0/t CAD3

总登记号 139454

在音乐世界中

ZAI YINYUE SHIJIE
ZHONG



在音乐世界中

[苏]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井 勤 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宾仪

封面设计：于文盛

译者序

在音乐世界中

(苏)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井 勤 苏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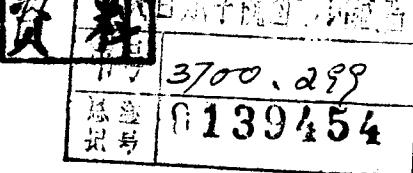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350×1163 1/32 印张6.5 字数 144,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册

书号：8078·3480 定价：1.05元



3700.299

卢那察尔斯基生平介绍

阿那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一八七五年生于波尔塔瓦一个官吏的家庭里。还在基辅第一中学读书时，他就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影响下的地下自学小组的成员，那年他才十四岁。两年之后，他开始在基辅城外工人区进行宣传工作，一八九三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政治上不可靠”，卢那察尔斯基未能进入俄国大学。因此，中学毕业后，他就出国去瑞士，在苏黎世大学的生物系和哲学系听课，同时，还在当时正流亡瑞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德的指导下研究哲学史。就在这一时期，他接触了苏黎世大学教授、马赫主义者理·阿芬那留斯的哲学体系。这个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观点的影响，后来又由于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友谊而加强，给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瑞士生活了两年之后，卢那察尔斯基回到了俄国，重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是一位宣传鼓动家和组织家。一八九九年，他同安·伊·叶里查罗娃（符·伊·列宁的妹妹）一起，参加恢复曾遭沙皇暗探局破坏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卢那察尔斯基随后的活动因被捕、坐牢和流放到卡卢加、沃洛格达、托基马等地而几度中断。但即使在流放期间，在沙皇警察的监视下，他仍然找机会在工人群众中（卡卢加麻布工厂）继续从事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党的工作。他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宣传新康德主义的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贝尔加耶夫，布尔加柯夫，弗兰克），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康德主义者伊凡诺

夫一拉祖姆尼克和其他反动分子。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卢那察尔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他积极地参加了彼得堡事件，他是罢工运动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的宣传鼓动者和组织者，在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他贯彻了列宁的策略。一九〇六年，沙皇政权策划逮捕卢那察尔斯基，并送交法庭审判，卢那察尔斯基不得不重新流亡国外，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才回国。

列宁很注意这个年青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并于一九〇四年会见了他。从那时起，卢那察尔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报刊的撰稿人，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刊《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部成员。卢那察尔斯基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政论家，以及他在瑞士、巴黎、比利时等俄国侨民面前同孟什维克辩论时表现出来的演说家的才能，曾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卢那察尔斯基笔名之一“沃莫诺夫”就是根据列宁的建议起的）。列宁还委托卢那察尔斯基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作过报告（关于武装起义和党对工会的态度等报告）。

在从事这些党的工作的同时，卢那察尔斯基仍继续从事文艺方面的活动，他是文艺评论家、戏剧家和一系列有关认识论、美学和宗教史等哲学著作的作者，这些著作曾在国外刊物和俄国合法刊物上发表。

当时，卢那察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不完全彻底。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对爱·马赫和理·阿芬那留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热衷。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个资产阶级哲学具有严肃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根据（马赫是物理学家，阿芬那留斯是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而想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反动形势下，在俄国党内知识分子和靠拢党的知识分子中发生思想动荡的时候，这种想法变得特别有害。一九〇九年，《无产者报》编委会的扩大会议严厉指责了卢那察尔斯基、马·高尔基和其他跟着亚·波格丹诺夫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哲学立场，

认为这种立场是同作为党的全部纲领和活动的基础的世界观不相容的。列宁在著名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里揭露了这个哲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本质。

不过，即使在（参加国家杜马问题和关于把革命工作的不合法方式同合法方式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同波格丹诺夫集团发生最严重的哲学和政治分歧的时期，列宁仍希望卢那察尔斯基回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来。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里说，使“卢那察尔斯基脱离波格丹诺夫，把他从背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斗争的惰性中拉过来，如果能这样就好了”。这种“脱离”是逐步发生的，从一九一二年起，卢那察尔斯基重新恢复同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站到了列宁的彻底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一边。在彼得格勒，在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卢那察尔斯基是号召推翻资本主义的群众集会的演说家之一，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一九一七年七月事变后，他被克伦斯基政府关进了监狱。

组织第一届苏联政府时，党任命卢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他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文化领域以及在苏联初等学校到高等学校的建设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他是校外政治教育工作和共和国全部科学和艺术生活的领导者。

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二年。从一九二九年起，他领导苏共中央执委会的学术和教育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因重病在身，未能赴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卢那察尔斯基因患心脏病在法国南部的曼通逝世。他安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城墙下。

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作用不能仅仅归结为他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一职。党和政府经常交给他各种任务。一九一九年，在邓尼金军队进攻的危急时刻，他在土里区的红军部队中，曾多次发表鼓动演说。他关于政治和社会文化问题的报告，许多城市、乡村和农业区中心的工人、教师、大学生、青年团员、科学技术工作者都听过。他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过许多国际外交会议（主要是国联的裁

军委员会)，以及讨论哲学、美学、历史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进行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大辩论中，以及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反对右倾的大辩论中，卢那察尔斯基是保卫党的路线的最积极的宣传者之一。他在北方边区、乌拉尔、西伯利亚、库尔斯克和其他中央各州领导过历时数周的苏维埃选举运动。他领导过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的文学和艺术研究院、列宁格勒科学院的文学研究院（一九二九年他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进行过广泛的反宗教的科学宣传；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大学讲授过西欧文学史和俄国文学史；他还是许多科学和文学艺术出版物、百科全书和文集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

从上面列举的这些方面，不仅可以看出卢那察尔斯基活动的广度，也可以看出他活动的主要本质：他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党员、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士。他利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各种活动方式，参加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

同时，在同许多职业不同的人们——教师、党的工作者、医生、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各类艺术工作者的交往当中，卢那察尔斯基个人的影响也起了不少作用。当然，他在文学方面所从事的工作，起的作用就更大。

卢那察尔斯基在为苏维埃政权争取知识分子方面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

卢那察尔斯基谈到自己时曾说过，他是“布尔什维克当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中的布尔什维克”。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当中的布尔什维克，所以特别为资本的奴仆们所仇恨和敌视。大部分旧知识分子是由动摇不定、在突然的社会变革面前惊慌失措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本能地死死抓住从小就被灌输的资产阶级成见不放，他们也不能不听取对新制度的本质和目的所作的真实、坚定和耐心的解释。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历史和当代事实的具体分析，努力引导自己的读者和听众，通过自己的职业，得出向每个人都指明了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这样的宣传，完全符合列宁学说的

精神，因而特别成功。

卢那察尔斯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大影响。他揭露反动观点时，善于指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发表的文章和口头演讲，很少是抽象的和纯理论性质的。他一贯是对文化历史材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榜样，而资产阶级思想界只会歪曲这些材料或是把它们弄得不可理解。资产阶级哲学、历史学和美学科学所搞乱搞糟的一些问题，他也能对它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这方面他也是榜样。卢那察尔斯基同资产阶级左派进步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争论有时是尖锐、愤怒和嘲弄性的；比如，他就肖伯纳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反革命的怀疑主义的公开信或罗曼·罗兰所著反对革命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剧本《爱和死的游戏》写的文章就是这样。但论战并没有导致破裂，相反，肖和罗兰直到卢那察尔斯基逝世，一直对他抱有友好的感情。可以这样肯定地说，是他直率的原则性的批评，促使了这些杰出人物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我们国家的朋友。

至于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和培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在工人和农民青年中培养）方面的工作，我们只能略微提一下，不然，我们就得陈述他作为人民委员、教员、演讲家、政论家和批评家的活动了，而在这些方面他是特别为青年人所敬爱的。

但我们不能不指出他教育工作中的一点，这对苏联音乐的发展起了十分根本性的作用。我指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对吸收文化遗产问题的态度。

如何对待过去的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什么新问题。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最初那些年月，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自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原有的分歧，又重新尖锐地发生了。有些共产党员（他们人数不多）看到许多新的探索的弱点，看到这些探索有颓废派的影响，就得出结论，认为在群众的普遍文化水平没有提高的时候，根本谈不上艺术的革新，而只应该宣传过去的艺术。但更多、更起劲的是一些主张对艺术立即进行激烈改造的人，他们认为旧的艺术珍品也应当和剥

削制度与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被推翻。列宁极其注意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大部分工人由于文化上的落后和对有关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的敌视，容易使他们甚至在一时之间接受“左”的小市民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革命“理论”。

党对假民主的左倾政策进行的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左倾政策是同在亚·波格丹诺夫及其追随者影响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联系在一起的(大约两年，一九一八年九月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波格丹诺夫在宣传“绝对新的”、“纯无产阶级”文化的同时，拒绝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早在革命以前，当他开始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时，他就这样做了。他掌握了资产阶级哲学的《最新成就》——马赫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反动哲学。但他恰恰把这种哲学看作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九二〇年，他把一些象征派和未来派的文学工作者吸收到“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去教那些初学写诗和写散文的工人。苏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公布于《艺术工作者通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3期)这样评定当时造成的情况：

“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混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敌对分子，他们有时实际上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权抓到了自己手里。未来派、颓废派分子、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拥护者，以及最后一些纯粹的失败者、来自资产阶级政界和哲学界的分子，开始在某些地方操纵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事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的招牌下，把哲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马赫主义)塞给了工人，而在艺术领域里，向工人灌输荒诞不经的艺术情趣(未来主义)。”

所谓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对待文化遗产方面变相的“左倾”态度，就是如此。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左派”共产党人的身上。这些人通常都热衷于哲学、艺术和教育中的时髦现象。

把马克思主义看待文化历史的观点彻底运用于艺术领域，运

用于伟大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遗产，就必然得出这样的信念：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对这些传统的遗产进行改造，才能导致新艺术的繁荣。

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①

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坚定卓绝地在理论上捍卫了这一对待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那察尔斯基才能对苏联知识分子和部分外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卢那察尔斯基就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苏略吉科夫、斯捷克洛夫、弗里契等人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这些人把艺术形式的进化直接同物质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并把艺术的全部思想内容归结为捍卫个别阶级的私利^②，由此，他们面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学法庭，把过去所有的时代等同起来，甚至说，按编年顺序，这是一个最新的时期。而卢那察尔斯基证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进行这场艺术论战的文章里，卢那察尔斯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了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和艺术发展的具体历史，并且指出，如列宁所说，“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上”，各历史阶段、各艺术流派和个别艺术现象所具有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以后，卢那察尔斯基日益深刻和彻底地发展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卢那察尔斯基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表明，列宁在一九一二年给高尔基的信中说的“如果卢那察尔斯基……在美学上脱离

① 瓦·伊·列宁：《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草案，写于1920年10月8日）。

② 参看1924年出版的卢那察尔斯基选集《戏剧与革命》中《再论戏剧》一文。

波格丹诺夫”这样就好了的话，是多么正确！

卢那察尔斯基作为人民委员和党的政策在艺术领域里的实际执行者的功勋，也是人们不会忘怀的。当时，一部分老知识分子害怕与一切新事物接触，企图使俄国艺术停滞在革命爆发时已经蜕化的现实主义水平上，停滞在依样画葫芦的模仿上——传统主义或自然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在反对这种保守主义的论战过程中，促使这部分知识分子去理解从资产阶级颓废派杜撰的所谓现实主义新流派转变到生动地和创造性地继承伟大历史传统的必要性。他也拒绝了另一批知识分子企图对艺术的垄断。这些人自命为“艺术中的革命家”，而实际上也是模仿者，而且是更坏的资产阶级艺术颓废派形式的模仿者。他们妄图怂恿人民群众对一切伟大的传统采取轻视态度，把现代主义的种种货色拿来充当无产阶级最珍贵的东西。

古代文物得以保存，也是同贯彻执行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政策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活动分不开的。他对博物馆的陈列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培养的工具。我们的歌剧院、芭蕾舞剧院和戏剧院的演出一直保持着高水平。对我们的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中的优秀传统，也作了宣传。

卢那察尔斯基，作为苏维埃政权在文化领域里的代表，根据列宁的政策的精神，对书刊很少采取行政禁止或类似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当然，如果出现在政治上直接敌视苏维埃制度或诲淫性作品等现象时，也并不排除采取这些手段。他认为，使艺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基本方法是党的原则性的批评、讨论、说服和同志式的劝告。他用党的方法捍卫艺术的党性。当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艺术的知识和了解，在基本原则上要坚定，在策略上则要灵活。卢那察尔斯基几乎不得不经常听到和看到人们是怎样非难他的：有人指责他迷恋过去，另一些人指责他支持未来派；一些人指责他自由主义，另一些人又指责他动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如此等等。要为这些攻击辩解有时是很困难的（直到

今天，有时还能遇到这些陈年旧帐的回声^①，但指责的渊源却被遗忘了。人们忘记了，所谓“迷恋过去”的责难，是由于卢那察尔斯基保存了特烈基亚科夫美术博物馆、爱尔米达日美术博物馆、大剧院、小剧院、艺术剧院而引起的；而“未来主义”的责难，则是因为他支持了马雅可夫斯基、梅耶荷德、科宁可夫）。

不言而喻，工作中难免有个别的错误，但卢那察尔斯基工作的总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他贯彻了党的总的指示的精神。为了在文化领域里实现列宁的政策，就必须在艺术的“消费者”中间进行工作（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在不脱离人民的情况下，促进人民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必须在艺术的“生产者”——艺术家、批评家、艺术理论家——中间进行工作，经常使他们关心人民的要求，用新提出的宏伟的历史任务鼓舞他们去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艺术。

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认为卢那察尔斯基是一名对事业完全称职的活动家。他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生动、鲜明和没有学究气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才能，而且在艺术和艺术评论中也有他自己独创的经验。在文化建设问题，特别是在苏联艺术发展等基本原则问题上，他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但当他把目前经历着的时代看作最初阶段的时候，他不倦地警告在具体问题上要防止“为时过早的正统思想”，他不无根据地担心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会利用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接近的关系，不去代表无产阶级说话，而把自己小圈子的“方向性”观点强加给无产阶级。卢那察尔斯基作为真正的苏联活动家，善于从全国的观点来考虑任何问题，他很关心保存现有的艺术珍品，把它们视为人民的财产。凡是新的创举，即使它们在许多方面尚有疑点，只要其中含有某种在将来能够健康发展的因素，他都一律给以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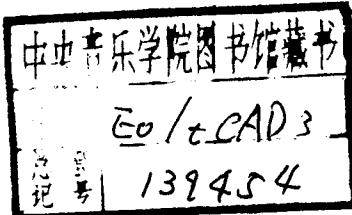
而最主要的是，卢那察尔斯基的全部国务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可以说，他的整个思想，都充满了对无产阶级、对人民的创

① 参看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卢那察尔斯基》条目以及 1955 年 12 月 26 日苏联《文学报》发表的纪念卢那察尔斯基诞生八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造力量，对共产主义必然的彻底胜利，对自由人类无穷无尽的进步力量及其光辉未来的信心。

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属于那种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生活的艰难和悲剧性方面的所谓乐观主义者。然而，人类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亲身经历的悲剧，对卢那察尔斯基来说，乃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大军的战士的光辉，勇敢和完整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

这种勇敢的战斗精神，成了他生命的本质，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他。无论是在社会生活道路上经受的困难，或是在最后两年折磨着他，并终于使他离开人世的沉重疾病，都没有削弱他的勇敢的战斗精神。



目 录

卢那察尔斯基生平介绍 1

在音乐世界中

序言	1
肖邦音乐的文化意义	3
论音乐剧	14
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都诺夫》	27
理查德·施特劳斯	34
贝多芬	46
再论贝多芬	52
柏辽兹的《浮士德之死》	56

音乐的社会学问题

序言	62
一本论述音乐的新书	66
社会学方法在音乐理论和音乐史方面的运用	79

其他有关音乐的论文和讲话

什么是对音乐的理解	99
答音乐学院共青团员们	102
贝多芬与当代生活	106
什么是贝多芬音乐中对我们仍有意义的东西	109

柴可夫斯基与当代生活.....	118
弗朗茨·舒柏特.....	121
音乐艺术的社会起源.....	124
理查德·华格纳的道路.....	136
尼·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149

《在音乐世界中》*序言

本书是由我的论述音乐的几篇文章构成的。这些文章写于不同的时期：有的是革命前写的，有的则写于革命之后。其中还收了几篇我应邀在一系列音乐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速记稿，还有几篇小评论，那是我应大剧院经理处的要求，为我们亲切的听众写的对个别歌剧的评论。

我当然不奢望《在音乐世界中》一书，在对音乐作科学和艺术的理解方面能给专家们提供什么东西。本书也不奢望成为普及音乐知识的读物，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有足够素养的音乐工作者，没有资格这样做。本书抱有另外的目的。它的任务是在音乐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方面的论著还很少，因此，我觉得我的文章还不算是多余的。

这些文章在强调包含在音乐作品中的思想感情的同时，竭力把这些思想感情与相应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这相应的社会环境既包括先进的社会理想，也包括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有时是有害的社会理想。

对音乐的纯形式方面的研究是一项更为细致和十分重要的任务。这种研究既可从音乐似乎具有的内在规律及其合乎规律的进化方面的观点进行，也可从这一形式同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刻联系的观点着手：一个方面是思想感情内容（通过它又同时代相联系），另一个方面是经济文化的普遍水平、乐器的组成，以及对音乐的形式方面有很大影响的技术特点。

* 本书1923年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由国家出版社出版。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写作音乐文化史的十分有趣的尝试。在西欧有这样的人(比如,康姆巴里埃^①和巴斯蒂安涅利^②),在俄国也有这样的人。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本书是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没有一本书可以同加乌津尼什坦^③远非完美无缺的著作《艺术和社会》媲美。加乌津尼什坦的著作完全谈造型艺术问题。从这一观点来说,我的这些不是科学论文的普及性文章也许是朝上面所说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这些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具有民主思想的听众中的音乐爱好者,从理性和感情方面更好地意识到在他们面前日益展开的音乐世界。

这些设想就是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根据。

作 者

一九二三年四月廿五日 克里姆林

① 茹里·康姆巴里埃(1855—1915)是法国音乐学家。

② 召诺托·巴斯蒂安涅利(1883—1927)是意大利音乐学家和评论家。

③ 威廉·加乌津尼什坦(1882—)是德国艺术史家和评论家。